

“网络文学前沿问题”笔谈(上)

网络文学的审美设定与技术批判

欧阳友权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探寻网络文学的学理原点需要确证这种文学的人文性审美设定, 据此开辟人类的审美空间, 提升文学的价值道义。在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时代, 人类应该保持对网络技术理性的批判精神, 避免网络写作中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 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 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

关键词: 网络文学; 审美设定; 技术批判; 人文本位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667-05

一、网络文学人文性的审美设定

在价值论的意义上, 网络文学之于人类的精神文化意义, 或许要大于它的艺术审美意义。认识的焦点就在于: 网络及其文学的出现是基于人的价值关怀, 还是基于一种技术理性? 换言之, 网络是否仅仅为文学提供了高效率的写作工具和便捷的传播渠道, 还是在为人类打造一个具有人文价值的技术平台, 以使得人类可以据此开辟自己的审美空间, 提升自己的精神意义? 门户网站“网易”在举办网络文学奖大赛时, 对网络文学作过这样的界定: “网络文学不是传统媒体的文学作品电子化后搬到网上的文学, 也不是利用网络的多媒体和 WEB 交互作用而创作出来的联手小说和多媒体剧本。网络文学是一种游历于网络之间的个体生命对于理想网络的渴望。不光具有感性, 又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需求。”^[1] 给网络文学做出这种人文性的价值定位, 虽然还不是艺术的、审美的解释, 却能把理性关注投向网络文学的人文原点, 不失为一种有识之论。

就其实质而言, 任何科学技术, 都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和驾驭, 并以此获得人在自然界中的自由, 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标志的现代高科技以其巨大的创造性功效, 帮

助人类认识自然又改造自然, 通过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来创造财富, 改变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条件。然而人类发展网络技术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膨胀物欲, 而是为了改善生存, 使人的生命更加完美。因为任何科学技术背后的人文宗旨, 都是通过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 来高扬人自身的个性、创造性和自由本性, 运用客观合规律的手段, 实现主观合目的的宗旨。在形而上的意义上, 物质性的科技手段开辟的是一片精神的绿野, 最尖端的科学探索回答的仍然是“认识你自己”这个最古老的人学命题, 最缜密的科学计算和技术实验收获的应该是大写的“人”的心智成果。因而, 从人文价值理性上探讨网络及其文学的意义, 应该避免单纯从“技术”和“工具”的角度看问题, 而需要确立起一种人文本位、价值立场和审美维度, 让技术的手段实现人文的目的, 从技术的背后发掘精神的价值, 使工具的辉光烛照理性的蕴涵。这样, 计算机网络技术就将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向着人的全部身心发出微笑, 实用性的技术必将折射出人文精神的自由洞天——这才是以信息技术为尖兵的现代高科技在适之于人类的艺术创造活动时, 应该有的价值定位——因为网络文学在让我们品尝艺术甘果的同时, 还让我们同时获得对自身本质力量的欣赏和对人性价值的确证, 进而

收稿日期: 2003-07-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2BZW0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01JA750·11-44043)

作者简介: 欧阳友权(1954-), 男, 湖北竹溪人, 中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理论, 网络文学与文化。

辅佐人类不断完善“科技进步—艺术发展—精神健全”的现代人文结构,“创造一个在其中人的非攻击性的、爱欲的、接受性的官能,与人的自由意识共同服务于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环境”^[2]。

其实,科学与人文的冲突由来已久。上个世纪中叶在英国出现的“斯诺命题”和1996年在美国出现的“索卡尔事件”表明,这种对立和冲突在现代社会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过化解这种冲突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它们多是由一些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来实施的。从古希腊哲学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提出“我既为人,人所具有的一切我莫不具有”,从18世纪卢梭等人发起的人文主义运动,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尽管这些人文主义思潮流派不同、观点各异,但却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和理想,即强调人的作用、地位和决定性力量,推崇人的价值与理性,留意人的精神潜能和人性关怀,主张用人文的力量校正科技的目标走向,以建造一个人类幸福的理性王国。

计算机网络出现以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急速汇涌于网络平台,它们的文化精神也在这里交织渗透。网络文学对人文精神的解构与建构^[3],就是“斯诺命题”在网络时代的一种伸延与解答,也是网络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对文学本质是否存在人文可能性的探求。不过在网络霸权成为技术进步的的决定性因素并逐步控制人类的“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求解“斯诺命题”、调制好科技与人文的两轮与两翼,仍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肃话题。因为科技进步的无止境加速不断打破科技与人文之间已有的平衡,人类刚刚培植起来的脆弱的人文理性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时刻面临被排挤和淡忘的危险。现代技术不仅改造了自然,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而且逐步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极易造成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分裂、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崩溃,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意识形态的宰制功能。高新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对物质欲望和现世幸福的需要,人类却可能不得不为此又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猛烈抨击过的:现代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消弭个性,大众媒介的垄断模式吞噬了文化差异和个人自由。工业文明把人孤零零束缚在机器系统的断片上,机器的轮盘剥夺了人类生存的和谐与生命的激情,人类制造的工具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窒息着人的价值和意义,技术理性漫渍了人的思维方式。于是,一切创造都丧失了原有的诗意,一切艺术也都成了

“文化工业”,技术的快车满载人的物质欲望直奔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人性的和谐与崇高。于是,“人文主义者所构想的理性王国在实践上表现为技术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技术以理性的名义支配着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成本和利润原则、效率原则等运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技术的权威之下,人的自主性消失殆尽。而这一切,都有悖于人文主义的崇高理想。”^[4]

如此说来,在人类为“科学万能”的幻想付出人文精神的沉重代价的时候,就需要进一步高擎人文价值理性的大纛,保持人类在科技理性面前应有的尊严。在Internet蛛网覆盖、触角延伸时,我们不仅要技术的物质效能上看待网络技术,还必须从技术的价值目标上来看待它,以一种道义襟抱的人文关怀来审视网络的意义和功能,在数字化的赛伯时空中追索人文大化的目的和价值。如弗洛姆(E·Fromm)在《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所言:技术社会的人道化应该使计算机一类的技术为人的生命进程服务,使其成为由人的理性和意志决定的目标的工具,而不是蹂躏或毁灭以生命为指向的社会系统,“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5]或如美国人文主义者芒福德(L·Mumford)所说的,技术进步的目标应该是关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所有方面,而不是只关心科技需求的功能;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精神,人类要想在现代技术“巨机器”面前有尊严的生存,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技术,而应该审慎地考虑人类本性与技术的关系^[6]。人类如果不能在技术的圣殿上添加人文的装备,技术的“圣火”就将灼伤人类自身。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断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长空间,然而,如果这种文学仅仅止于媒介传播和时尚文化消费的意义,而不能以自身的诗性魅力抒发人类的审美情怀,用技术的基质承载艺术的人文价值、建构审美的精神家园,人们对它的艺术期待就将是无所依凭的。当网络文学的媒介更新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休闲娱乐消解审美意义的时候,它得到将不会是艺术的尊重,而是文学审美本体的缺失和历史合理性的悬置。

于是,面对网络文学,我们需要重铸这样的价值理念:用数码技术表征艺术审美,以电子媒体彰显文学本性,是网络文学必须坚守的本体论承诺。同时需要追问:当表达人类审美襟抱的文学踏上Internet

快车步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候,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技术与艺术的融通?网络时代的文学创作需要的究竟是工具理性还是诗性智慧?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不能从审美认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在艺术本体论上为之付出价值缺失和意图谬误的代价,形成审美导向的失依与失范。

网络文学是在计算机数码技术和“万维网”(world wide web)超文本链接技术联合打造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里找到自己的生存平台的,技术的灵性一开始就凝结为文学因子。由于电子媒介的“软载体”超文本特性,使得文学话语失去纸介书写的线性真实感和“硬载体”印刷文本的物质当量性,其“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又给笛卡尔以来澄明而确定的主客二元世界带来含混与挑战——人机关系依存于虚拟的符号中介,以光速传递和转换的信息代码使作者与他所用的词语或图像之间的相遇方式是短暂、流动而非物质性的,作者和机器的关系犹如拉康所说“镜像”关系,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消失了,主体性与客体性一道丧失了完整性和稳定性,物质现实与符号代码、网际语境与客观叙事、身份虚拟与真实表达、主体与客体在此时都走向同一,不仅文学本体成为一种虚拟状态,而且文学活动主体的自我确证方式也遭到改写,因为赛博空间的虚拟隐喻是无需习俗隐喻作对位式衔接的。于是,失去审美本体论支撑的电子化技术不仅耗尽了文学精神内容和价值形式的有效资源,形成网络时代的文学意义危机,而且抹平了主体与客体、生活与艺术、符号与现实界限的网络书写还会导致文学本体论危机。这时候,技术霸权支撑下的文学怎样出场以证明自己仍将是一种审美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技术的结果,以及如何避免技术对文学审美的遮蔽,似乎就不再是一个技艺、工具或艺术形式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审美、文学本性的学理本体性问题。许多网络作品被讥之为“电子烟尘”“信息垃圾”“心情留言板”等,大抵都与艺术审美设定的本体缺席有关。

二、网络文学的技术理性批判

李政道博士说过,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但这枚“硬币”本身是什么呢?它就是人性。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但它们却都要追求符合人性的善,以人文诉求为价值理性的终极关

怀。如果把科学沦为艺术的游戏,或者将艺术沦为科学的工具,那么就会使人性的基础遭致双重打击。然而,现代科技作为社会的进步力量不会顾及艺术的变迁,而艺术的发展能否一直伴随科技的进步跳好优雅的“狐步舞”呢?高科技对生存诗意面纱的撕开,科技产业对人文情感的漠视,文化工业对艺术精神的消泯,视听影像对文字魅力的瓦解,以及快餐文化对经典艺术的冲击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造成人类精神家园和审美情怀的沦落。所以,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人类的艺术审美历程是否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不断“进步性”,网络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保持了人类的审美设定还是降低了艺术的审美品位,艺术于本体的意义上是前进了还是退步了,乃至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是看其“艺术”的人文性审美内涵还是使用“技术”工具来比量,都不再是不证自明的问题,而是需要重新考辨和认识的。

被称作“第四媒体”的计算机网络借助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已日渐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尊万能的偶像,这使得“技术沙文主义”又有了滋生的土壤,并通过一定观念模式或理论形态导致技术理性的横行无忌,以及人文价值理性的遮蔽和冷落。于是我们看到,网络技术一方面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发挥着宰制大众意识、诱导大众行为的操纵功能,用标准化、复制性的文化产品把自己设定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强加给大众;另一方面,又在精神生活领域千方百计抬高“技术的艺术性”以打造“艺术的技术化”,用技术的手段改变人们对艺术的认知方式和感悟方式,修正传统的艺术观念,消解乃至摧毁人文的审美创造性,影响艺术的“出场”方式和功能范式。在网络文学身上,技术的因素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都要多,因而不仅容易出现如评论者所讥讽的“只见网络没有文学”的现象,而且还容易在观念上叛逃文学应有的审美原点,宽容乃至助长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导致文学的“非艺术化”。为此,网络文学要想在文学进步的历史节点上赢得人们的普遍尊重,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避免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最早从事网络文学写作的人多不是搞文学的,甚至不是搞“文”的,而是学理工出身,属于文学边缘人群或业余文学钟情族。如痞子蔡是学水利的,邢育森是学通讯的,安妮宝贝、宁财神最初是学金融的,李寻欢也是学理工出身,恩雅原来是个画家,黑可可曾在外企工作,“新语丝”的领头人方舟子是生物学博士……

他们大多都是率先“触网”者,上网摆弄文学完全是休闲时的“无心插柳”,更多的是游戏冲动,而非审美动机。台湾网络作家痞子蔡就曾说:“我并没有很好的文学底子,所以写东西是靠热忱,而不是凭实力,我相信在网路上,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7]从技术的角度说,电子传播更适于艺术中的游戏倾向,因为它追求瞬间性的感官效果,画面的迅速切换消解了人们心中对于永恒性的崇拜,而有声有色的高强度感官刺激则在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欲望的同时,使原先向往纯美与崇高的理性思维麻木了。游戏是人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的重要形式,它使人们得以超越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局限,让个性向世界敞开,让人性朝自由放飞。然而,仅凭“拖动鼠标与网络共舞”的游戏冲动创造艺术,难免会放弃创作时的责任和道义,松懈审美意志和艺术执着,甚或背弃“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宗旨;如果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还可能使艺术活动失去庄重和崇高,乃至抛弃价值和意义,最终使创作始于游戏而止于游戏,网络的“撒欢场”上将再也难觅“文学”的踪影。时下的许多网上写作被讥之为“灌水”“倒痰盂”“乱贴大字报”等,恐怕就与这些写手以技术游戏替代审美动机有关。一些网络作者“成名之迅速与流芳之短暂”成正比,大抵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二是避免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网络是一门技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首先是由技术载体的分野引起的。“以机换笔”“软载体飘移”“无纸传播”“蛛网覆盖”“触角延伸”“虚拟现实”“交互式写作”等等,都是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崭新名词。但网络技术不等于艺术,技术优势不等于文学强势。作家张抗抗就曾质疑:网络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但它能否改变文学本身?文学源于精神而不是源于技术,技术只是艺术借助的工具,它应该受驭于艺术,为创作者遵循艺术规律插上创造的翅膀,而不是以技术优势替代艺术规律。

艺术起源于技术,但艺术一旦从技术中剥离出来就超越了技术,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创造性而朝着价值理性迈进。计算机网络技术无论多么神奇,它仍然只是技术而不是艺术。技术可以具有“艺术性”,而艺术则不能走向“技术化”。因为技术只是艺

术创作或欣赏的道具,它永远代替不了艺术本身。艺术是精神的结晶,而技术属于物质的操作;艺术创作如春蚕吐丝般酿造生命的境界,技术则像庖丁解牛一样实现驾驭对象的自由。网络技术能使人类实现“数字化生存”,但人类的生存决不仅仅是靠“数字化”就能包打天下的;同样,网络技术能为文学艺术插上科学的翅膀,但它飞翔的目的地应该是艺术的圣殿而不是技术的作坊。对于稔熟计算机网络技术优势却不懂文艺创作规律的“网虫”“闪客”们来说,他们在网上“玩文学”,容易走入两个误区:要么流于戏谑、肤浅、粗疏和随意,使创作成为“孤独化狂欢”的游戏,使作品成为“准文学”“非文学”或“网际文化快餐”;要么视“玩技术”为“玩文学”,以技术优势替代艺术规律,以工具理念替代审美价值,把文学对审美的关注改造为操作对技术的关注。

三是避免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而价值理性是以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以及人性的终极关怀为皈依的人文精神。工具理性着眼于“器”的因素和“物”的目的,价值理性瞩目于“人”的因素和“道”的宗旨,它们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及其认知方式。网络工具理性是一种见物不见人、重器不重道、重手段不辨目的、重技治效应不重科学精神的实用主义技术观。它通过主客分立的二元论,导致技术至上,使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破坏性的力量横陈在人类面前,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美国的大卫·格里芬曾嘲笑过这种技术与人性相悖的状况:“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消除一切具有主观性的词汇。我不说‘我饿了’,而是说‘K-14在燃烧’。当觉得妒火中烧时,我也许只是说:‘亲爱的,我的G-3活跃起来。’对此,我的情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亲爱的,这的确驱散了我的G-7’。”^[8]工具理性带给人类的就将是这样一幅可怕图景。

网络作为文学的“工具”,是人类迄今为止发表作品最容易、传播作品最便捷的技术载体。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人们可以笼天地于尺幅之间,挫万物于光标之处,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达成“咫尺天涯”“瞬间永恒”,让幻想成为现实而不失其真。在这一点上,网络的虚拟与艺术的虚构和想象有重合的一面,这对文艺创作是有利的;但另一方

而,由于网络技术的新奇和玄妙,又可能使人们陷入技术工具的黑洞而不能自拔,进而迷失艺术的本性,误将虚拟的读屏符号当作普遍的价值出发点,将人类导向意义和价值虚无的危途。因为在网络写作中,电子化的工具打造的是普遍化、标准化、纯数量化的时空模式,“比特”作为软载体符号已经伪装成具有自然的直接性和呈现性,数字化技术的工具优势作为艺术的催化者,通过将非自然、非人性的成分引入时间、意识、理性、历史的世界之中,并运用超文本或超媒体符号思维的外在干预,形成自然呈现的中断和价值理性的阻隔,不仅导致网络工具人为而任意地对人的愿望的生产,而且形成艺术对人性和人文的偏离和背弃。

从“技术—社会—人”的哲学视野上看,网络时代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取代,必将导致人类对高技术的盲从,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漠视,造成社会进步中人与技术的本末倒置。影响所及,会造成技术进步而道德沦丧、科学发达而人文堕落、工具先进而文化颓败、物质丰赡而精神贫乏、生活优裕而思想疲软等种种“现代文明病”。今天,互联网技术的泡沫已经把工具的功能由感性的认知推到理性的认同,不同程度存在的伦理匮乏、人文失落和精神萎缩,导致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打着“科学”的招牌危害社会、摧残人性,高科技犯罪日渐增多,技术对财富的增值效应使许多人忙于用技术满足自己的物欲和享乐,科技产品的无奇不有和无所不能又使得人们从舒适中滋长出惰性,钝化了进取和拼争的锐气……这正印证了卢梭在18世纪说过的那句谏言:随

着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光芒在天边上升起,德性也就消失了。

看来,我们从审美设定上考辨网络文学的时候,需要坚守的仍然是人文本位,反对以技术主义替代人文动机和审美规律,更不能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正确的立场是:“放弃机械论的二分法,提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同时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或者有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有科学精神有人文科学,这两者相结合,发展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同时发展有科学精神的人类道德。”^[9]

参考文献:

- [1] 谢有顺. 需要深度和审美[N]. 文学报, 2000. 04. 20(4).
- [2]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9: 31.
- [3] 欧阳友权. 论网络文学的精神取向[J]. 文艺研究, 2002, (5): 74-82.
- [4] 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4.
- [5] Erich Fromm.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M]. New York & Row, 1968. 96.
- [6]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ed C. by C. Mitcha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77-78.
- [7] 痞子蔡. 感性宣言[A].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9. 227.
- [8] 大卫·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 马季方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85. 185.
- [9] 王大明, 于光远. 论科学精神[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94.

The aesthetic definitude and criticism of network literature

OUYANG You-q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f we 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the network literature's principle, we should confirm this kind of literature's humanism and its aesthetic definitude. Human beings can open up the aesthetic space and strengthen the literature's value significance. Network literature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human beings need to keep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of network technique and avoid having the game impulse instead of the aesthetic motive, the technology wisdom instead of the art rule, and the tools reason instead of the value reason in network writing.

Key words: network literature; aesthetic definitude; technology criticism; humanism essence